

Book Review

Alison Hardie, *The Many Faces of Ruan Dacheng: Poet, Playwright, Politician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22, 308 pp.

知人与论文

《多面阮大铖：中国十七世纪的诗人、曲家与政客》书评

Alison Hardie

School of Languages, Cultures and Societies, University of Leeds, U.K.

A.M.Hardie@leeds.ac.uk

Reviewer: 胡菀麟¹

Wanlin HU

中国浙江大学文学院

School of Litera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China

kingslinghu@163.com

DOI: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2012421>

在晚明文人的心态、身份、诗文作品研究方面，前有晚清近代以来的陈寅恪（1890–1969）、谢国桢（1901–1982）等前辈学人，后有当下赵园、左东岭、何宗美等中国学者，研究成果可谓蔚为大观。在西方汉学界，明清之际相关文人研究也有李惠仪（Wai-yeec Li）、梅尔清（Tobie Meyer-Fong）等学者付诸努力。众多学者耕耘于此，大抵基于此阶段纠集着王朝更替的复杂历史谜疑，又因清统治者采取了复杂政策，使这一易代时期兼具两个民族、两种文化冲突矛盾又包举融通的魅力——正是这些纷繁和迷雾引起了东西学界的共同兴趣。

在明末清初的时代环境中，阮大铖（1587–1646）可谓臭名昭著。盖因其创作的作品水准虽在当世已获士林肯定，文品尚佳，却在东林党争和江山易代时的行为而备受唾弃。《明史》更是直接将其编入《奸臣传》，家乡的地志书写出现“桐城不要、怀宁不收”的尴尬境地。终有清一代，兼受《桃花扇》和四库馆臣的评价影响，阮大铖的文学价值被长期湮没。

到了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文学界开始重新审视阮大铖，力主剥去后世加诸其上的道德评价，实现更客观、独立的文学研究。这在当时掀起了一波阮大铖研究热。陈寅恪、胡先骕（1894–1968）、王伯沆（1871–1944）等作为最早跳出清朝馆臣文学评论框架的学者先贤，纷纷对阮大铖的文学成就给予肯定。陈寅恪认为阮大铖诗歌“同是有明一代诗什之佼佼者”（陈寅恪，1980），胡先骕更将阮大铖称为“有明一代唯一之诗人”（胡先骕，2023）。在此领域内，胡金望（1952–2013）成果颇丰，其重新点校的阮大铖诗歌《咏怀堂诗集》是中国大陆首版阮

收稿日期：2026-02-26；修改日期：2026-04-03；录用日期：2026-05-01

作者简介：¹胡菀麟，浙江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大铖诗歌作品集，于 2004 年出版的《人生喜剧与喜剧人生——阮大铖研究》更是作为第一部研究阮大铖的专著，从方志、家谱等方面广泛收集诸多资料将阮大铖研究推向深入。而后，郑雷、刘致中、李玉栓、张惠、张永刚、谢谦、朱倬等学者在阮大铖文学研究领域皆有论述。但也有不少学者对阮大铖仍抱有负面看法，如何满子、耿法、屈超耘等。时至今日，阮大铖研究在戏剧传奇方面可谓果实累累，人物研究虽走出了孔尚任《桃花扇》后的片面形象结论，却仍多集中在对阮大铖人品文品的讨论及家世、交游等方面；部分论证存在一方面重复明清时人对阮大铖戏曲艺术成绩肯定，一方面对其诗文艺术成就的分析稍显单薄的境况。阮大铖研究如欲汇入主流文学史视野、走出文学史边缘境遇，则需摆脱前人著述的羁绊，以文本细读为路径，以公正平允的事实依据寻回失却的话语。

尽管海外汉学界早在 20 世纪四十年代，就有美国汉学家恒慕义（Arthur W. Hummel, 1884–1975）在梳理清代名人传记资料时简要介绍了阮大铖的个人生平（Hummel, 1943），但此后一直未曾引起海外学者的特别注意。直至 2022 年，英国利兹大学名誉研究员夏丽森（Alison Hardie）的著作 *The Many Faces of Ruan Dacheng: Poet, Playwright, Politician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由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作为海外汉学界第一部介绍晚明争议文人阮大铖的著作，可谓甫一上市就备受关注，时代意义不言而喻。此前，夏丽森的研究领域主要涉及中国园林史和明清社会文化史，曾参与翻译计成所著《园冶》（Ji, 1988）、杨桂梅所著《图说中国瓷器简史》（Yang, 2020）等著作，促进了中西方在艺术人文领域的交流。此次新作书名似可译作《多面阮大铖：十七世纪中国的诗人、曲家与政客》，从书名即可知，作者写作目的在于尽可能还原一个立体多面的阮大铖，旨在对阮大铖真实的人生经历进行补充并探讨其经历、爱好与文学之间的联系。

以具体的人物为研究对象需首先对人物进行介绍。在序言处，夏丽森以小说般的叙述方式，将主人公阮大铖娓娓引出。随后由阮大铖戏剧性的死亡引发思考：若阮大铖的人品如传闻般恶劣，为何仆人会对其身后事竭忠尽智？从盖棺定论的负面历史评价，与身边仆人、同行人员、历史评论家之间的观点冲突来看，夏丽森认为这至少说明阮大铖存在未被历史书写注意到的不同面。在抛出悬疑后，本书方进入阮大铖人生和诗文分析的正文部分。

全书结构层次清晰，除附表、序言和结论、附录外，共有七个章节，据内容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至三章，首先对阮大铖的家庭背景和早年、晚年仕宦经历进行了简要叙述；第二部即第四章，主要讨论阮大铖的生活与文学；第三部为第五、六、七章，探讨阮大铖的真实性、仕与隐的选择以及作品中边缘化色彩所反映出的问题。在介绍阮大铖时，作者从阮大铖诗歌中对家世背景的自豪和认同感进行切入。夏丽森采取了人物史的惯用写法，依据时间顺序线性地展开阮大铖的一生，重点关注深切扭转主人公人生轨迹的《留都防乱公揭》。她避开了《明史》对阮大铖的脸谱化形象描写，将阮大铖的无奈之举放置在晚明的时代背景下进行审视。

在对魏忠贤免职等一系列关键历史节点进行爬梳后，夏丽森认为阮大铖和魏忠贤之间并未如传言一般存在养父子关系，《留都》存在个人主观偏见的抹黑色彩，进而得出阮大铖并非阉党的判断。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此论断与国内现学界达成基本共识，对于向西方世界介绍阮大铖具有客观且完整的意义。值得肯定的是，对于阮大铖是否为当时士林不齿的结论，夏丽森特意考察了除东林党之外的同时代明人如张岱等人的评价。据此，她指出晚明士林中仍然有相当一部分群体对阮大铖的评价偏中立，未见太多质疑。这提示对于部分争议文人的研究，需首先甄别历史书写的情感偏向及话语权归属问题。

夏丽森对繁富史料的串联索引可谓用功颇深。整体而言，该书的优点大致有三：

其一，观照人物家世与生活经历的心理研究路径。在介绍阮大铖的早期生活时，作者注意到阮籍之于阮大铖、魏晋文学之于宋、明两代之间的共通性，为读者指明文人文化及贵族制取代官僚制的时代背景。夏丽森认为，从阮大铖为书斋取名“诵心堂”的举动可以看出，其因自比先祖阮籍而对自己造成了负面的心理暗示。这促使其采用与先祖共同的表现方式：将隐秘的心理借由隐晦的语言进行表达。故而，阮大铖的诗歌作品常常表现出承袭自“阮旨遥深”“百代之下，难以情测”的隐晦。又因阮大铖曾过继叔父又再被认回亲父身边的特殊经历，导致阮大铖在自我身份的认同上存在双重认知。以上原因共同塑造了阮大铖文学作品中的多样性、复杂性，为后世解蔽其文带来阅读屏障。借助心理学分析方法解释阮大铖的人格因素，这一角度与陈安梅的研究相似，但二者同中有异。陈安梅（2009）认为，阮大铖过继后内心缺乏安全感，导致其在交友和处理与东林党关系时以利益相结、不肯信人；而夏丽森则倾向于阮大铖是因过继经历产生了心理上的双重身份认同，在随后的党争抉择时才会反复处于对立夹缝之中。近年来，对晚明文人隐秘心态开掘的研究路径，严志雄（2024）、李秉星（2021）的钱谦益相关研究可资借鉴。此外，夏丽森注意到阮大铖有意效仿家族中优秀的军事领导先祖，这一点目前国内学界还鲜有论及。她将阮大铖对先人的模仿行为，与阮大铖军人身份的自我认知以及后续抗匪、抗清时所作出的一系列抉择进行联系，以加强对阮大铖心态与行为选择的理解。出于个人前期的学缘特点，夏丽森对阮大铖的住宅“集园”“咏怀堂”颇多关注，她认为住宅的命名是阮大铖有意为之的表演。这样的表演性行为在晚明文人身上并非个例，而是整个晚明社会的普遍现象。在进行以上种种对阮大铖的形象说明时，夏丽森从同时期文人评价、后世史家眼中和传记文本塑造这三个方面进行详细梳理，再辅以例证说明，使得本书的逻辑架次清晰有序，达到启发读者辩证思考同时无碍阅读趣味的效果。

其二，从诗文旧材料中发掘异域元素的新阐释方向。新材料的开发受到多重局限，在此情境下，学术研究应对既有未受到关注的旧材料进行主动开掘。域外学者或因自身角度问题，常关注到明末文人诗文中表现出的异域色彩。夏丽森发现，阮大铖在诗歌、戏剧中较为频繁地谈及边疆事务及海外风土人情，认为这一现象与阮大铖被时政边缘化的经历有关。在对阮大铖

的边疆诗进行文本细读后，夏丽森将这类大量堆砌边关地名、植物名，化用汉朝对抗匈奴典故的边疆诗歌评价为“调高而无货”，难以显见阮大铖具有何种特殊的政治才能。这样的论断是基于诗歌文本细读分析和历史史料分析上的，故而较有说服力。然而，这却间接佐证了阮大铖诗歌文学价值不高的既有陈论。对于阮大铖的传奇戏剧，夏丽森认为其故意安排众多异域元素，如《春灯谜》中的喇嘛、《牟尼合》和《双金榜》中的地域等。正是这些异域色彩为阮大铖的戏剧增添了精彩的场面。此外，她还总结出阮大铖戏剧中的人物角色也多带着“英俊沉下僚”的特点，认为是阮大铖在政治上的不如意反映到戏剧中，表现为一种弱者主题（underdog）。分析指出，这种心态除阮大铖自身被政治边缘化的原因之外，还反映出其受到阳明心学的影响。

其三，借文化史视野重新审视并拆解文学作品的生成经过。对于中国的传奇戏剧，海外汉学界自 20 世纪八十年代就表现出了较高的兴趣。伊维德（Wilt L. Idema）编译的著作（Idema, 1982）作为一本中国戏曲文学资料书，在海内外已引起反响。相比起国内业已形成讨论明末各色戏曲文人的开放格局，海外汉学界的目光更多尚停留在元代和明中晚期的一批名家如关汉卿、马致远、徐渭、汤显祖等人身上。近年来，海外汉学对戏曲的讨论开始顾及稍晚期、较边缘的一众戏曲家。如白之（Cyril Birch, 1925–2023）将阮大铖的《燕子笺》与汤显祖《牡丹亭》、梁辰鱼《浣纱记》等一起列为明代的代表性剧作（Birch, 1995）。2022 年出版的 *How to Read Chinese Drama: A Guided Anthology* 介绍了几位文学史上并不常提及的传奇作家如李日华、吴炳和阮大铖（Sieber & Llamas, 2022）。但整体而言，对阮大铖戏曲艺术的讨论仍多集中于其剧作家身份和参与创作等方面。大多著作仅介绍其一、二部传奇作品或在章节中简短地提及。《剑桥中国文学史》在“戏曲”一节中曾简短地提及阮大铖，但仅为了说明晚明时期“精英人士往往介入戏曲的每一环节”（Chang & Owen, 2010）。中国学界则有徐朔方先生《明代文学史》（2021）特别指出，阮大铖戏剧的思想水平较低，且双线结构、巧合剧情的写法安排是时代惯用手法，并无创新之处。而夏丽森关注明末出版业发展下插图印刷背后的文本隐喻，这是该书最突出的一个优点。她发现阮大铖与插图绘画者张绣之间是好友关系，故而《春灯谜》的木板插画设计中有部分阮大铖自己的理解。对于从阮大铖戏剧中过度索隐的行为，夏丽森与胡金望均持审慎态度，这是对阮大铖文学作品进行探索乃至晚明文学研究都应注意的问题。在图文关系研究方面，从图中器物形象发覆物质文化史不经意处、以图中用典隐喻考据观念变迁，本是人文研究的长处。随着相关研究的推进，在纵向挖掘深度、横向加强联系等方面对研究者提出以跨学科视野勾连、整合各领域知识的更高要求。

北美汉学界历来关注文学经典的塑造、流变过程。早在 15 世纪，费尔南多·德·罗哈斯（Fernando de Rojas, 1465–1541）就提出，印刷工人的存在会干扰读者理解文本的观点，因为印刷工人会对原文本进行增补。而林·亨特（Lynn Hunt）则在此基础上表示，图书出版印刷为文本带来的影响不是单向的，创作者同样可以利用出版印刷为文本增添多重意蕴，文化史对

印刷机器、文本生产过程的反思应是双向而非单向的（Hunt, 2011）。夏丽森基于新文化史的研究视角，提出阮大铖希冀通过插图传达隐藏信息、有意在戏剧中重塑自己形象的主张。她认为，阮大铖此举是一种有意参与变化文本印刷进而促使作品文本意义发生转变的行为。插图的加入为文本创造了隐喻阅读，盖因“文字与图像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互文关系”（陆涛、张丽，2013），常被视为作者难以写明的言外之意，可视为文本的延续与补充。米歇尔曾提出：“一部文化史就是语言与图像不断分合的历史。”（Mitchell, 1986）研究插画的意义在于思考文本的传播途径和改写问题，此即出于新文化史视野下对文本流动性进行动态考虑的需要。通过聚焦书籍创作、印刷、出版的过程，力求呈现过程中的各方参与力量，揭示运行机制背后的权力力量。在分析阮大铖戏剧插画时，夏丽森进行了详细分类，并从不同的插画中解读、补充部分阮大铖的思想。其中，以对插画中的长髯人物和阮大铖绰号“阮胡子”之间是否存在关联的讨论较为生动有趣。

中国学界的图像叙事研究多集中于《西厢记》《桃花扇》等戏曲名篇。而此般将插图作为诗文内容补充、延展、透射来理解作者的理解方式本无可厚非，但既有研究面临的问题是：解释的角度因人而异，且难以证明是作者授意抑或插画绘制者自己私意附加，故而对于材料的选取就需要研究者严格筛选、把关。对于记录者、绘画者变形后的文本而言，改造的过程属于第二接受者自我理解后的再创作，与第一原作者之间又隔一层。因此，这样的再造痕迹是否具有或具有多少权威性，似也应纳入考虑的范畴。叶晔曾概括明代的整体文学世界，可分为包括明人持续建设而成的留存世界在内的三个维度（叶晔，2020），那么对于阮大铖的文学作品，在审视其再印刷的文本或插画时，既应注意到阮大铖作为创作者和阅读者的视角转变，关注到其进行自我定位以期进行怎样的作品留存行为，也应注意分辨该二次加工究竟隶属于谁的意识。至于阮大铖戏曲中是否存在影射政敌的政治问题，自明代张岱而后就一直存在索隐的观点。而夏丽森此书特意避开了这一问题，选择另从插画寻找线索。在论述过程中，她不时进行中西方文学的对比观照，如论及舞台戏剧表演时联系到了莎士比亚、论及主题时联系到了英国的“雅各宾文学”（Jacobean Literature）等，间或以实物石刻作为补充材料，进行文献互证，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作为首部向西方介绍阮大铖的个人专著，该书还有不少亮点。如从阮大铖藏于宁波天一阁秘而不显的部分诗歌中，探索阮大铖诗歌具有轻松诙谐的一面；如以附录形式列出与阮大铖相交的重要人物名单，对其亲友、敌人进行了细致分类等。就该书对材料理解、断句及园林考证有误之处，已有学者指出（游胜辉，2023）。在此之外，惜于篇幅问题，该书尚有部分论述未能详尽，如对早期诗集《和箫堂》和后期《咏怀堂诗集》之间风格变化的讨论较少，缺少对诗人诗风发展的线性讨论；在信息收集方面，缺少后续阮大铖新出史料的补充；对其结社、交游情况及阮大铖在中江社、群社、海门社等社团及社员心中的形象问题讨论较少；认为阮大铖名

声被牢牢钉在耻辱柱上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无嗣导致无人替其辩解，这一判断也值得商榷。

对于阮大铖诗品、文品与人品关系研究方向，学界论述业已有之。但在近几十年学界研究的推进后，当下再议的意义十分有限。具体的价值定论需以事实佐证。于道德层面而言，将阮大铖诗、文置于非主流的研究地位符合常理。若人品尚可归咎于历史成因、外部环境塑造和后世评价扭曲，则其文品水平是现今学术研究唯一可视、可控、可解的实际证据。“人如其文”中的“人”究竟如何固难尽知，但“文”却是可以直接感知的存在。阮大铖戏曲因曲折婉转、言辞优美的艺术风格一直为人们所称道，而阮大铖的诗歌、散文等其他文体究竟是否同样具有与现阶段评价不符的地位，则需进一步加强论述。就阮大铖诗歌而言，民国时期已有部分学者进行讨论，持肯定态度的除上文提及的陈寅恪、胡先骕以外，还有陈三立（1853–1937）、章炳麟（1869–1936）等前辈，均对阮大铖的五言、七言诗表现出一致认可；而钱锺书（1910–1998）则另持轻微批判态度，认为阮大铖的山水诗意在淡泊却姿态造作，显得“通身不安详自在”（钱锺书，1984）。那么，对于阮大铖诗歌艺术价值的讨论，便在较大的龃龉中有着可供深入探讨的空间。夏丽森在书中则多叙、少议，与目前国内阮大铖诗歌研究的表现一致，但已然尝试将阮大铖与公安派诗风进行联系考察。阮大铖诗、文在晚明文坛的定位及风格溯源，仍是今后的相关文学研究待发力之处；只有在特定的学术视野下回答好这一问题，阮大铖的文学价值才会被真正肯定。至于世人长期以来对阮大铖的情感倾向，主要由阮大铖其人的历史原因引发，与有无后人替其辩解的关系不大。因历史中可寻出不少有后代仍声名狼藉如秦桧、无后代却名垂后世如柳永一类的反例。“知人”与“论文”都不可避免地需要回到历史语境进行讨论。对此，游胜辉为探讨阮大铖的自我形象建构做出了较好的尝试（游胜辉，2025）。人的多面性可以肯定，文学价值能够再论，但就其人在关键时刻的所作所为而言，史笔书写与人心相背自有其法，道德的是非审判与文学的价值判断理应有所区分。

晚明文人群体在易代时期的抉择向来受到人文研究领域的关注。重估部分文人的文学价值、正视晚明文人身上的复杂多面性，有助于了解明清易代时期的社会历史，此即夏丽森教授写作目的之一。同时也应看到，夏丽森在翻译戏曲方面致功颇深。如何将明清戏曲在翻译成英文的同时还能做到信、达、雅，这对译者来说的确是不小的挑战。此书在出版后不久随即引起中国学界的注意，浙江大学出版社将于近期出版中译本。相信对中华文化有较深了解和体会，并有着丰富翻译经验的夏丽森，能在此书后进一步打开中西方文化在晚明社会文化史上交流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 Birch, C. (1995). *Scenes for Mandarins: The Elite Theater of the Ming*.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Campbell, D. M., & Hardie, A. (2020). *The Dumbarton Oaks Anthology of Chinese Garden Literature*. 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and Collection.
- Chang, K. S., & Owen, S. (2010).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ttps://doi.org/10.1017/CHOL9780521855587>
- Idema, W. L., & West, S. H. (1982). *Chinese Theater, 1100–1450: A Source Book*. Franz Steiner Verlag. <https://doi.org/10.2307/2057158>
- Hunt, L. (1989).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ttps://doi.org/10.1525/9780520908925>
- Ji, C. (1988). *The Craft of Gardens: The Classic Chinese Text on Garden Design* (A. Hardie, Trans.). Yale University Press.
- Mitchell, W. J. T. (1986). *Iconology: Image, Text, Ideolog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ttps://doi.org/10.7208/chicago/9780226148052.001.0001>
- Sieber, P. A., & Llamas, R. (Eds.) (2022). *How to Read Chinese Drama: A Guided Antholog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7312/sieb18648>
- Swisher, E. (1943). Juan Ta-ch'êng. In Hummel, A. W. (Ed.),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Yang, G. M. (2020). *Illustrated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Porcelain: History-Culture-Aesthetics* (A. Hardie, Trans.). Shanghai Press.
- 陈安梅. (2009). 明朝阮大铖人生悲剧的家庭成因分析. *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1(5), 638–640. <http://doi.org/10.3969/j.issn.1008-9713.2009.05.036>.
- 陈寅恪. (1980). *柳如是别传*. 上海古籍出版社.
- 胡金望. (2004). *人生喜剧与喜剧人生: 阮大铖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胡先骕. (2023). *胡先骕全集*. 江西人民出版社.
- 李秉星. (2021). 忏悔的诗学: 钱谦益《投笔集》中的用事和隐微写作. *励耘学刊(文学卷)*, (2), 248–269.
- 陆涛, 张丽. (2013). 明清小说出版中的语—图互文现象. *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0(4), 38–44. <https://doi.org/10.20063/j.cnki.cn37-1452/c.2013.04.009>
- 钱锺书. (1984). *谈艺录*. 中华书局.
- 徐朔方, 孙秋克. (2021). *明代文学史*. 浙江大学出版社.
- 叶晔. (2021). 明代: 古典文学的文本凝定及其意义. *中国文学年鉴*, (1), 907–909.
- 游胜辉. (2023). 评 Alison Hardie, *The Many Faces of Ruan Dacheng: Poet, Playwright, Politician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漢學研究*, 41(3), 305–312.
- 游胜辉. (2025). 力图推翻逆案: 论阮大铖以诗塑造的自我形象. *文與哲*, 46, 221–278.
- 严志雄. (2024). *钱谦益的诗文, 生命与身后名*.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王杰)